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者文选

何方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何 方 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方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4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ISBN 7-5004-2962-2

I . 何… II . 中… III . ①何方-文集 ②外交-文集 ③国际问题-文集 IV . D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3957 号

责任编辑 周兴泉

责任校对 林福国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1201 印刷厂 装 订 1201 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75 插 页 2

字 数 303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出版说明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

1999年11月14日

114 23/1

编者的话

何方同志 1922 年 10 月 18 日出生在陕西省临潼县一个农民家庭。1938 年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去了安吴青训班，受完训即转赴延安（中途被国民党扣留，拘押一月后逃出），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1 年抗大 5 周年因工作积极受到总校表彰。同年奉调学俄文，并在外语学校参加整风运动。1945 年派赴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任辽阳县委宣传部长、辽宁省青委副书记等。1950 年随张闻天转入外交战线，专门研究国际问题。1951 年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1955 年调回外交部任专员、办公厅副主任，仍然主要从事研究工作。1959 年后长期下放。1979 年平反，随即参加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工作。1980 年筹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并出任所长。1988—1995 年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1993 年被授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为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俄（原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几个对外友好协会的理事和一些学术团体的顾问。何方同志从事国际问题研究 50 年，1999 年离休后仍笔耕不已，只是方向作了

较大调整，集中写有关张闻天的两方面问题。一是响应杨尚昆1997年提出的“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的号召，写点有关张闻天在总书记岗位上作为党的一代领导核心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及其长期遭抹杀的材料；二是写点本人跟张闻天工作多年的感受和反思，特别是十年外交。

何方同志研究国际问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50年代。这十年中他在张闻天的直接指导下研究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写了许多内部研究报告，为外交工作和中央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例如1951年关于朝鲜停战和谈的报告，1954年关于苏联批判个人崇拜的反映，日内瓦会议期间关于英法等国在远东要求维持现状和划界而治的文章等，都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登在1955年《外事研究》第1期上的《关于美国外交策略的新变化》，还受到毛泽东的赞扬。50年代下半期的研究更是直接为外交服务，除写形势分析和政策建议的研究报告外，还起草各种内部文件和外交文书，主编《外交通报》、《外事动态》（两者不但受到外事部门，而且也受到中央和各部委、省市的称赞和欢迎）、《外事研究》、《业务研究》等几种内部刊物。此外，也参与过一些中央文件如政府工作报告的国际形势与对外关系部分，以及某些领导同志的讲话等的起草工作。50年代，何方同志正年富力强，又得益于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张闻天的指导和熏陶，所以是他研究成果最多、写作量最大的十年，但基本上都属于内部性质，又不署名，个人保存的底稿也完全丧失。本文集所采用的驻苏使馆时期的两篇，还是《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经特许在外交部查阅有关张闻天的档案时发现的。

第二个时期是1959—1978年。庐山会议（八届八中全会）后何方同志受到牵连，长期下放农村。不过在此期间，他仍一直关注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特别是利用时间阅读了大量理论书籍

和国际问题资料，有机会时也还写点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稿。例如在“五七干校”期间（1969—1978），1972年后劳动已很少，大部分时间可用来读书和思考问题。他因深感中国经济在国际比较中的日益落后，有一阵曾对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作过系统研究，写了数万字的材料，并给宦乡等一些同志看过。这也与他后来受命筹办日本研究所有关。

第三个时期是1978年恢复工作到1999年初离休。这是何方同志离开外交部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从事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研究的20年。1979年平反后调到中央成立的专门研究苏联问题的国际问题写作小组，但同时也参与过其他某些问题的研究酝酿、以至给中央写报告，如李一氓主持的建议改变战争不可避免的提法，以及“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不能成立”等几个报告；宦乡牵头的关于拉开与美距离、调整对苏关系、改变“一条线”外交战略的报告。还积极支持宦乡倡导的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参加各种交流活动。在筹办和主持日本研究所后，他的研究范围有所拓宽，就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写过数十篇论文，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80年代上半期，他任全国日本学科规划组长，对全国的研究进行协调，还首先提出研究日本必须去日本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组织全国日本研究机构的领导人去日本考察以及创建日本文化这一学科分支的研究机构，等等，对我国的日本学科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不过这十年中他的主攻方向仍然是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特别是一些带理论性和战略性的问题，如世界格局和时代问题等。调到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工作更加名副其实，更可发挥他的特长，因而学术上也更加活跃。只是研究成果以内部调研报告为多，此外又增加了一项政策建议的内容。总之，恢复工作后的这20年，是何方同志能够比较顺利和稳定地专心从事研究和学术思想走向成熟的20年，个人对国际问题的基本观点

和看法也多是这个时期形成的。

下面就根据他近十多年来发表的著作，简单介绍一下他的几个主要学术观点。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他所持的这些观点，在国内学术界，有的接近于共识，有的还在争论，有的则相当孤立，但他却始终坚持不渝。

一是关于时代问题。1986年，何方同志根据对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学习后的体会，提出世界早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而不再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他认为，过去很长时期，我们由于没有及时认识到时代主题的变化，还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观点并据此制定内外政策，所以在世界经济大发展中错过了一次重要机会。因为同其他社会发展规律一样，时代及其主题既是趋势又是现实，认识到就可利用，否则只能吃亏。作为时代主题的和平与发展是客观存在，不管你是否承认和怎样改变提法，世界大战还是打不起来，经济科技仍在快速发展，但机会却是稍纵即逝。

二是关于世界格局。由两极格局走向多极化，这是人们老早就在谈论的。何方同志只是在80年代中期提出过渡期问题，认为由于处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这次世界格局的转变将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国际形势会不时出现动荡和局部冲突，但总体上仍然是趋向缓和。在发展不平衡规律导致的大国实力均衡化和发展中国家崛起两大因素推动下，多极化已成为必然趋势，这也意味着从长远看美国的相对衰落将是不可逆转的。

三是关于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苏联解体后，何方同志曾提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已从美苏矛盾转化为西方国家间的矛盾。既然主要矛盾是指规定、制约其他矛盾和影响全局的一对矛盾，那在冷战后以至今后相当时期，只有西方国家间的关系（即矛盾，表现为竞争、协调等）才能在世界经

济和国际政治中起主导和决定性作用。他认为，由于长期受斗争哲学（政治上表现为极左）的影响，容易看问题只重视事物的矛盾与斗争这一面，忽视统一与协调的另一面，因此一提主要矛盾，就以为是最尖锐最激烈的一对，而不管其在全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其实这是莫大的误解。例如现时的中美矛盾，固然尖锐激烈，但并不足以左右整个国际形势，即使打起仗来，也属于局部战争。所以邓小平说，“中国没有资格打世界大战”，“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有一种提法说是各国人民和美国霸权主义间的矛盾，这和冷战时说的世界人民和“两超”的矛盾一样，不但非常含糊，而且首先不能算是国际（国家间）关系中的矛盾。

四是关于南北差距问题。这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和作为整体的发展中国家间在经济总量和人均产值上的差距。何方同志认为，说南北差距一直在扩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以至策略上，都是站不住的。从理论上讲，它的实质是不承认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这可能也是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忽略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因此一提世界格局和多极化，就是“一超多强”，把广大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一提全球化，就说成是“西方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是被卷进去的。实际上，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大事，而且大部分时间作为整体的发展速度都超过发达国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种趋势还将继续下去，二三十年后，在经济总量上前者将赶上和超过后者，只是人均赶上要用长得多的时间。他认为，不可把南北差距和贫富差距混为一谈，也不能谈南北差距时把中、印、巴西、东盟等主要组成部分不计算在南方之内。为什么说策略上也不妥呢？因为我们的政策目标是在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50年内先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如果只是为了揭露西方和国际秩序的不平

等而渲染南北差距的扩大，那无异于给我国群众和其他许多与我们抱同样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泼冷水，赶超战略也成了自欺之谈。说“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的中国日益繁荣富强，同时又谈“第三世界的进一步贫困”，逻辑上也不通。

五是关于邓小平理论。何方同志在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看法。例如他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发展时谈到因不同时空划分发展阶段的几个原则和标志，认为：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称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或“马列主义”不大合适；指引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列宁主义不能照搬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同样，也不应把毛泽东思想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套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等。他把邓小平理论表述为：邓小平理论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与政策，特别是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与政策。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一切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国家遭受程度不同的挫折，就是由于没有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共同规律。

以上只是举几个例子，何方同志的学术观点当然不止这些。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他都有自己一定的独到见解。

何方同志工作中一贯遵循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一直爱好理论学习，先后读过大量马恩列斯著作，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造诣。但他从不拘泥经典作家的书本知识和现成结论，而是坚持实事求是和独立思考，反对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与实用主义、人云亦云和“随风倒”。他特别重视学术上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论见解和政策意见，经常强调“没有新意的文章不要写”。他治学严谨，也乐于奖掖后进，与他领导下的同志特别是青年的关系都处得很好。由他组织和主持写的文章或书籍，即使经过他

一再修改，他也不让列上自己的名字，更不分享稿费和编辑费。

本文集主要收录了何方同志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有关国际问题的论文，这两年所写讨论党史有些独到见解的文章未包括在内。何方同志研究国际问题 50 年，为了留作纪念，书中选取了他 50 年代的四篇文稿。他参加革命很早，没上过什么正规学校，能够从事科研工作，且知识面较广，主要得益于他一贯的刻苦自学，所以文集选了一篇谈自学的文章。此外还选了与研究工作有关的两篇纪念性文字，是对他的恩师张闻天和李一氓的片断论述。

本文集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及其学术委员会的支持和指导下，由我负责具体的选编工作，并经何方同志筛选圈定。我曾在何方同志身边工作多年，此后也一直保持着工作上的联系和交往，比较注意他的革命经历和学术观点，更不用说耳濡目染他勤奋治学治所和严于律己的作风了。所以，虽然我自知水平有限，还是乐于担任这一具体工作。同时，本文集的出版，不仅是何方同志本人从事国际问题研究诸多著述的一个总结，也表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他几十年取得的研究成果的重视和对日本研究所科研工作的鼓励。只是限于篇幅，文集收入的是反映他主要学术观点的代表性文字。全书分四个部分，各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按原件发排，作者仅对一些文章的个别字句做了技术性的修订。对本书内容，作者嘱请专家和所有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林 强

2000 年 9 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国际问题与对外关系

| | |
|----------------------|---------|
| 驳侵略者口中的“中美友谊史实” | (3) |
| 关于朝鲜停战的和谈问题 | (22) |
| 评英国的所谓亚洲洛迦诺计划 | (29) |
| 有关当前民族独立运动的几个问题 | (41) |
| 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就 | (57) |
| 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和调整对外政策的建议 | (62) |
|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 | (72) |
| 过渡时期国际形势的若干问题 | (75) |
|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新阶段 | (106) |
| 南北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 (113) |
|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几个问题 | (117) |
| 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十个问题 | (128) |

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

记取历史教训 发展中日友好

- 纪念“卢沟桥事件”50周年 (147)
深厚的友情 永恒的纪念 (155)
日本面临第三次历史性选择 (162)
对中日关系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186)

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

- 我们所处的时代 (197)
国际问题研究中的几个观念问题 (242)
论邓小平理论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地位 (252)
关于时代问题讨论的回顾
——再论和平与发展时代 (282)

其 他

双城县永乐村调查

- 双城永乐村两个屯的调查 (335)
重印《台湾府志三种》序 (344)
张闻天与新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 (351)
《模糊的荧屏》不模糊
——纪念李一氓同志诞辰90周年 (370)
也谈点自学的体会 (376)

- 作者著作目录 (384)

- 作者年表 (391)

国际问题与对外关系

驳侵略者口中的“中美友谊史实”

惯于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狡辩其侵略中国的行为时，又在进行欺骗宣传了。战争贩子杜勒斯与奥斯汀，1950年11月底曾先后在联大政委会与安理会上发表了无耻的冗长演说，除了重复其诡辩侵略朝鲜及中国台湾的陈腔旧调之外，还讲了一大堆所谓“中美人民友谊”的“史实”，企图把百余年来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援助”中国和“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好像没有美国侵略者的“保护”，中国老早就已灭亡了。但是果真如此吗？恰巧相反，奥斯汀所列举的那些“史实”，正是美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罪行录。中国人民从历代的切身经验中，早已认清了这个口蜜腹剑、经常进行欺骗宣传的侵略者——美帝国主义。

奥斯汀把1844年美国政府逼迫中国所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称做“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完整”，并且说这“一直是美国政策的一个主要意向”。他列举了1899年海约翰的“门户开放照会”，1908年的罗脱—高平协定，1915年美国要求“最惠国”待遇的照会，1917年的蓝辛—石井协定，1921年到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1932年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等，统名之曰“美